

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加重的社會—教育傳導機制與治理路徑

劉建銀

The Social-Educational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Path for the Academic Overburden o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引用本文:

劉建銀. 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加重的社會—教育傳導機制與治理路徑[J]. 現代教育論叢, 2024, (3): 28-36.

您可能感興趣的其他文章

1. "家長主義"時代家校的权利边界、互動機制與教育公平

引用本文: 趙同友. "家長主義"時代家校的权利边界、互動機制與教育公平[J]. 現代教育論叢, 2022(1): 41-49.

2. 變化世界中的教育政策與教育改革①

引用本文: 范國睿, 托馬斯·S. 波普科維茨. 變化世界中的教育政策與教育改革①[J]. 現代教育論叢, 2021(3): 3-13.

3. 社會的缺席與道德個體的培養——重思涂爾干道德教育理論

引用本文: 項繼發, 柏晉萍. 社會的缺席與道德個體的培養——重思涂爾干道德教育理論[J]. 現代教育論叢, 2020(3): 16-26.

4. 鄉村小規模學校教育質量困境及其突破——基於有效學校理論框架的個案剖析

引用本文: 趙丹, 趙闊. 鄉村小規模學校教育質量困境及其突破——基於有效學校理論框架的個案剖析[J]. 現代教育論叢, 2020(6): 18-23.

5.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資源共享的SWOT分析及實現路徑

引用本文: 岳建軍.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資源共享的SWOT分析及實現路徑[J]. 現代教育論叢, 2019(3): 41-46.

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加重的社會—教育 傳導機制與治理路徑

劉建銀

(重慶師範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 重慶 401331)

摘要: 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越來越依賴學校教育獲得, 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將競爭集中在普通學校教育體系內的優質資源, 社會公平訴求又將選拔標準單一化為書本可測知識成績的排名, 不可避免出現考試難度越來越大、學習進度越來越超前、時間越來越長、負擔越來越重的後果。過重課業負擔對學習韌性和身心健康的影響令人擔憂。減輕過重課業負擔是一場持久戰, 需要繼續強化“雙減”治理、明確長期可持續學習的價值導向、重構多樣化教育體系以及推動主要勞動力市場選人機制轉型, 進而走出“治理—惡化—再治理—再惡化”的莫比烏斯循環。

關鍵詞: 過重課業負擔; 社會—教育傳導機制; 治理路徑

中圖分類號: G5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6762 (2024) 03-0028-09

引用格式: 劉建銀. 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加重的社會—教育傳導機制與治理路徑 [J]. 現代教育論叢, 2024 (3): 28-36.

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歷來是中央關心、群眾關切、社會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以“雙減”為代表的減負政策在過去三十多年里頻繁出臺, 取得的成效是顯著的。但是, 當前從家長、教師、學生到隱形變異的校外培訓機構, 各種精細規劃校外輔導、超前超綱超速教學、壓縮擠占休息時間、反復大量集中刷題等加重學生課業負擔的行為仍不在少數, 從根本上扭轉家校社加重課業負擔的“雞娃”行為任重道遠。讓人疑惑的是, 為什麼我國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在歷史上總是不同程度地反復出現? 甚至減了又增、名減實增、校減家增、內減外增、增了又增, 進而成為基礎教育難以根治的頑瘡痼疾? 甚至不少家長、地方教育行政部門、校長教師和隱形變異培訓機構成了“偏激的大多數”, 進而讓過重課業負擔越來越向生命早期的兒童發展階段前移?

既往文獻從微观的作業管理機制、學生角色外溢到宏观的政策工具、優質資源均衡、過度資本化 and 社會流動等方面展開了分析^[1-3], 對理解過重課業負擔的形成和治理提供了很好啟示, 但是還缺乏深入地、

收稿日期: 2023-12-25

作者簡介: 劉建銀, 男, 四川鄰水人, 重慶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政策與法律, 電子郵箱: scljy@126.com。

基金項目: 2021年重慶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重慶教育領域突出問題治理研究”(2021NDYB121)

整体链条式地揭示社会—教育的压力传导机制。教育从来都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教育问题深受社会系统的制约。因此，探讨教育领域中的老大难问题，必须从社会—教育的生成链条加以思考，这正是本文的目标。

一、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加重的社会—教育传导机制

（一）个体向上流动的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学校教育获得

教育增进个人收益、教育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向上流动的基础性作用被许多理论和实践所证实。由于学校教育普及水平的提高，非学校化教育很难单独支撑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而且随着教育普及的学段层级越来越高，个人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所需要的学校教育时间越来越长，社会对学校教育的重视程度在加剧而不是在减缓。

任何国家和地区必然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层。因为一个社会不同人群必然在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占有上存在差异，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地位差别的客观事实。^[4]这种差异与分化无需有意设计，只要社会存在便会自然形成。无论是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还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差异也将长期存在，不可能被完全消灭并走向绝对扁平化。因为每个人的天资禀赋、努力程度、环境支持和发展机会存在差异，在追求向上发展而非以共同贫穷为荣的条件下，家庭资本的差异及其自我强化也会进一步累积并催化子代之间的差异。所以，埋怨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或妄图在一个社会中消灭地位差异是徒劳的。反过来说，如果不同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金字塔被压得绝对扁平，个人的劳动创造总是被公共汲取或被平均分配，那么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工作活力就会严重受挫。

当然，承认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放任其自由变化。国家除了通过税收等方式调节收入差距、缩小阶层差异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给中下层充足的向上流动机会，也就是让他们看到自己有机会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必须承认并鼓励社会竞争，保持社会不断向上向前的发展活力。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地位固化，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职业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世袭的方式获得或在闭环中再生产，那么长期下去不同人群就会出现尖锐的利益对立，社会就可能撕裂，稳定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导致社会运动和革命事件的发生。所以，保持着充分的社会流动，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向上流动的竞争中，正是社会活力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不管在哪个国家，不管这个国家人口有多少，这样的社会竞争应该允许其永远存在。否则，这个国家必将缺乏活力而逐步走向没落。

改革开放前后，个体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方式是多样化的。除了通过学校教育而进入更高一级的学段外，多数工人子弟可以通过合规的“子女顶替”或“内招”方式继承父辈在国营工厂中的职位^[5]，有的工农兵学员可以通过基层推荐进入大学读书^[6]，有的通过招干或参军进入行政机关或军队系统，有的通过做生意变成“万元户”，还有的通过拜师学艺成为当地技术能手……总之，个体实现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正规学校教育的作用有限。但是，技术升级或产业转型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相应的教育普及水平必须从初等教育上移到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而这些几乎都需要正规的学校教育来完成。与之相对应，随着我国选人用人制度的改革，从党政机关、军队、事业单位到国有企业，几乎都实现了公开考试招聘入职。参加入职考试的前提是，应考者必须有文凭信号作为“敲门砖”或者有相应的知识积累。即便通过做生意实现向上流动，技术迭代也需要创业者具备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基础。总之，一个人要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越来越需要接受更长时间的正规的学校教育，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描绘的“文凭社会”在我国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无论是选人用人上的招考改革,还是教育普及程度和规模的提高,都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巨大进步,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为什么这种进步反而加重了群体性的教育焦虑?可能是因为这种进步直接提高了社会向上流动竞争的教育门槛,像过去仅有初等中等文化就可以参军或进厂,甚至没有文化水平都能有“卖茶叶蛋胜过搞原子弹”的收入,或者借助“关系”担任公职人员,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出现了。这就压缩了过去人们实现向上流动的不依赖教育或少依赖教育的多样化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过度的教育竞争并非社会经济地位固化带来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国家实行了更加公平的基于教育或知识文化的向上流动和社会竞争,才让人充分看到了教育成层(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的重要作用。这个趋势如果继续演化,其结果就是个人实现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不仅越来越依赖教育获得,而且会依赖更长时段、更为优质的教育获得,从而必然会向前向后拉长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

(二) 劳动力市场分割映射使竞争越来越集中于普通学校教育中的优质资源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s Theory)认为,劳动力市场并非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纯粹均衡的、同质的市场,而是会因制度性因素或结构性因素而区隔。最典型的二元分割理论(Dual Theory)就认为存在主次两类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不仅劳动报酬高、福利待遇好,而且工作稳定、工作条件优越,还有更多的培训教育机会,容易晋升。次要劳动力市场则相反。需要注意的是,相似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在不同市场中得不到相同的劳动报酬。而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存在进入壁垒,次要劳动力市场声誉欠佳,因此两个劳动力市场彼此很难通过相互流动来缩小劳动报酬差异。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个全球性现象,无论在美国、英国还是中国,都不同程度存在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7, 8]当然,导致分割的因素或划分分割的标准有差异。以我国为例,我国因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一直激励着“农村娃”通过接受教育跳出农门,进入城市这一主要劳动力市场。即便在城市,也存在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和外来务工劳动力市场的区隔。我国因“编制”而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以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或协会以及大量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为核心构成了体制内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使大量毕业生慨叹“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此外,基于行业、职业、区域等也可形成主次劳动力市场,从而引发人们对劳动力市场分割多样性的关注。

如果劳动力市场依据教育水平进行层级分割还尚可理解,因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与收入相关。但是,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其二元分割及其所映射的普职教育之间形成了封闭的莫比乌斯环。一方面,优质就业单位为了减少人事成本,比较依赖文凭信号的筛选作用。比如,在有“编制”的主要劳动力市场,高职生、中职生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基本没有报名资格,哪怕是在基层的技能岗位。

“互联网大厂”等优质就业单位则基本到“双一流”等普通高等学校中开展校招。有的企业职普学生工作条件和晋升机会差异十分明显。另一方面,教育系统也形成了适应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的育人格局。无论在制度安排还是现实实践中,普通教育几乎集中了国家和地区的所有优质资源。比如,在高中阶段,八九十年代还有中专中师作为优质教育资源,而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只要人们一提及各地的优质高中,无论是北上广的大学附中,还是重庆的“一三八”、天津的“市五所”、成都的“四七九”,毫无疑问都是普通中学。在招生安排上,中等职业学校总是去兜底揽接普通高中选剩的学生。高等教育阶段职普分层则更为明显,高等职业院校学制绝大多数只有三年,只有学历没有学位授予权力。在招生顺序中,他们同样被制度性地安排到最后。在出口上,职业学校学生想要升本读研就要接受普通学校的

考核標準，而且名額少、通道窄。多年來，政策對職業院校的這種制度性定位、社會對職業院校的這種認知沒有改變。在這種狀況下，學校教育的競爭通道不得不進一步窄化到普通學校教育。所以，儘管國家多年來在職業教育上投入了很多經費，在招生方式上做了多樣化探索，也擴充了職業教育入學機會，但機會越是擴展大家越是充滿“分流焦慮”或“落選焦慮”。因為每個家庭都理性地看到了優秀學生的選擇、優質教育資源的集聚和其對應的未來就業市場的差異。職業教育這個競爭賽道不管路有多寬，都不是他們的優先選項。

既然大家集中在普通學校教育賽道競爭，那麼擴充這一賽道的優質資源、把賽道加寬實現其優質均衡能否解決問題呢？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思考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在普通中小學優質教育資源大幅擴充、中高考錄取比例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大幅提高的背景之下，為什麼這種競爭現象沒有緩解反而讓人感覺越來越嚴重？經歷過俗稱“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時代的60到80後，那時的優質教育資源極其匱乏，但大家只是在中學畢業年級有較重的課業負擔，其他年級不僅保持正常節奏，更沒有將超前學習向生命早期前移，讓幼兒和小學階段學生就承受課業之重。第二，為什麼越是優質基礎教育資源匯聚的地區（如北京海澱區、重慶沙坪壩區、廣州天河區等），越是那些被人們稱作優質教育資源的重點校示範校，其學生的課業負擔反而更嚴重？是否優質教育資源的擴大反而激化了對有限優秀生源的爭奪？第三，同一體系內的優質教育資源能實現均衡嗎？資源既然定義為優質，那麼它一定是稀缺的。一般來說，原來的優質資源一旦均衡以後，自然又會在其中凸顯出新的更好的優質資源。就是說，當優質教育資源池得到擴充被稀釋之後，除了資源本身會分层外，社會也會對資源進行重新評價進而去優中選優，所形成的“劇場效應”絲毫不會減弱對更加優質教育資源的競爭。本文並不反對擴充優質資源，但需要考慮如何定義優質資源，如何使優質資源分布多樣化而非同質化。

（三）社會公平訴求使普通學校教育的選拔標準越來越單一

沒有哪個教育者會相信，幾張考試卷子的成績能夠反映一個學生的全部知識和能力，能夠作為一個人能否升入更高一級學校的唯一評價依據。因此，從改革開放之初恢復中高考制度以來，我國就逐漸嘗試採取多樣化的方式選拔人才。各種加分制度、特長生制度、自主招生制度、保送制度以及基於中高考的綜合評價錄取模式等，就是在穩住中高考這一主流選才制度的基礎上，希望開辟多樣化選才的改革嘗試，目的就是使人才選拔能夠更加全面、科學。但是，多樣化選才方式要么被人質疑可能存在制度上的不平等，要么因“人情關係”的侵蝕而失敗。

以過去大學自主招生為例。自主招生賦予了高水平大學相應的綜合素質面試考核權力，開辟了一條多樣化選才的新渠道。但自主招生被人詬病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考試內容和考試形式對“寒門子弟”不利。當人才選拔集中於考核領導力、志願活動、口才表達、問題探究能力、邏輯分析能力以及課外拓展性知識時，來自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子女因為家庭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約束，往往處於不利的地位。如果這樣的選才方式比例過大，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子女向上流動的渠道就可能被制度性阻隔。當前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學探索的高考加綜合素質評價測試，讓人同樣質疑的問題在於能力面試以及高中綜合素質評價對弱勢家庭子女是否公平。除非國家使用反區隔性制度，去對沖因家庭資本帶來的不利影響，給弱勢家庭子女專門的向上流動渠道。但如果這種選拔方式規模過大，也會引起中上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擔憂。當然，每種選拔方式都很难做到絕對公平，但是否可能造成群體性的、制度性的選拔區隔，這是全面推行某種選拔方式必須深入考量的問題。

更何況，中國社會是一個“人情關係社會”。費孝通指出了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中國人際關

系像一块石头在水面上形成的波纹，人们以自己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就顺着水波推展开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从而形成了人际交往的圈子。^[9]人们会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孙隆基指出，中国人的世界是一种人情化的世界，中国人会按照是否是“自己人”的逻辑，按照“亲疏有别”“内外有别”的层次去做人。^[10]“人情法则不仅是一种用来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稳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环境中用来争取可用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讲求人情法则的社会，必然是个关系取向的社会。”^[11]可以说，“搞关系”“走后门”给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性带来巨大挑战，它不停地侵蚀着综合、灵活的选才方式，倒逼着教育人才的选拔越来越依赖并窄化于可测知识的笔试。例如，如果有的选拔需要论文等研究成果，那么家长替孩子出成果或者利用资源赋予孩子研究成果的情况就很难避免。^[12]我国中高考取消多项考试加分项目，甚至对各类可能成为加分项的竞赛、保送等进行严加管制，就是看到了加分赛道不仅给学生带来了负担，而且存在着“灰色操作空间”。

可以说，人们对公平的追求始终是悬在人才选拔方式上的一把利剑，始终牵动着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每一次多样化选拔方式的尝试是很有益的，但也都冒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和难以预计的社会后果。所以，回过头来看，只有基于标准答案的书本知识的笔试——这一经典形式——才是最公平、公开、公正的，而且操作和管理起来又最简单，最容易规避风险。于是，从各种升学考试到获取职业资格再到考公考编，建基于书本的可测知识的笔试就成了拦住各种“搞关系”“走后门”的刚性门槛，成为社会充分认可并屡试不爽的人才选拔“万金油”方式。因此，无论中高考或研究生入学考试如何改革，是改考试时间、改科目组合、改考试内容，还是改计分方式，稳如磐石不能改的就是对有标准答案的所学书本知识的纸笔考试，这几乎成了政府、学校和家长笃信的“王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形成，主要在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越来越依赖学校教育的获得，而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的映射将学校教育里的竞争又局限于普通学校教育单一体系内的优质资源，社会公平诉求又将这种竞争简单化为书本上的可测知识笔试成绩排名，路越走越窄，赛道越来越拥挤，竞争越来越白热化，导致家长和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压力增大，大家分别从校外和校内为学生加码，课业负担自然会越来越重（见下图）。当然，课业负担过重也与社会比较或圈群传播、媒体广告渲染的焦虑氛围以及资本介入有关，我们也把它们作为一种社会因素，它们催化并放大了家长焦虑。当然，也有人责备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或教师以及家长的非理性认知或素养参差不齐。^[13]但是，这些起催化作用的因素不是终极因，而且鉴于前人文献有所分析，因而本文不做专门论述。总而言之，是社会—教育链条中的结构性问题造成了家校社的共同认知，从而导致大家不得不成为“偏激的大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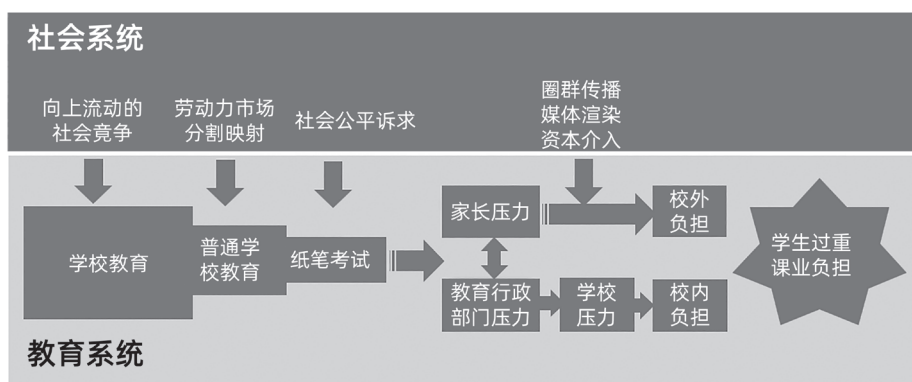


图1 中小生课业负担加重的社会—教育传导机制

二、基於社會—教育傳導機制的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治理路徑

從歷史來看，我國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並非今天才存在，而且由於社會系統與教育系統互相膠著，負擔加重的慣性巨大以致積重難返。更何況教育人才選拔問題牽涉社會敏感的神經，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社會輿論，而且嘗試其他考試選拔形式還需要解決許多技術難題。因此，試圖徹底扭轉或消解這個問題是徒勞的，緩解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不是一場殲滅戰、速決戰，需要持之以恆、久久為功，可以從持續強化課業負擔治理、明確價值導向、教育多樣化體系構建以及推動社會用人機制轉型等方面進行。

（一）以“雙減”為重點從供需兩側深化過重課業負擔的治理

儘管過重課業負擔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結構性因素，但是從供需兩側以“雙減”為重點的減負舉措在短期來看仍有重大意義。目前，校內作業負擔在小學低段減得比較明顯，小學中高段和中學階段則不盡如人意，各項負擔“濤聲依舊”。音樂、美術、體育、勞動教育和小學科學等課程被語數外搶占，拖堂占用休息機會的情況較為常見。小學高段主要是為應對小升初選拔或初中學習適應，家長通過校外培訓加給孩子的奧數、英語或超前學習初中課程的負擔。中學生的負擔主要來自學校。可以說，學校給學生布置的家庭書面作業完成時間遠遠超過“雙減”要求。筆者隨機調研某城市初一年級學生僅開學首月周末作業：數學作業是兩張A3試卷共74道計算題、練習冊兩個單元21道練習題；語文作業是抄寫練習冊1—7課共120個字詞、千字表100個詞語、撰寫1篇作文；英語作業是畫出第一單元思維導圖、總結冠詞用法及例句、復習第一單元；美術作業是素材收集；地理作業是地球模型描畫。整個書面作業完成時間快的學生也不會少於5個小時，該月學生至少已做過10套試卷！學期內各種周考、單元考等“定時練習”十分頻繁，還有月預備考、月考、期中期末預備考及正式考。可見題海戰術依然是老師們不變的法宝，“做題家”依然是老師們的培養目標。要在短期內扭轉中學的升學績效主義十分困難，但當前特別要防止作業“大水漫灌”、防止教師過度擠壓課餘時間和其他非考課程時間的極端做法。

在校外培訓方面，25家從事中小學教育培訓的上市公司基本退出了學科類培訓，有的省市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已經壓減到兩位數，過去鋪天蓋地的培訓廣告和招牌幾乎銷聲匿跡。有必要繼續保持高壓態勢，在前期去規模化、去低齡化、去過度化培訓的治理基礎上，持續深化規範和壓減成果。首先，要繼續從法律、教育和技术三方面治理現有自媒體中的基礎教育教輔類產品廣告。^[14]其次，要全面取消面向0—6歲兒童的學科培訓項目。其實，大多數面向0—6歲兒童的胎教班、新思維班、記憶術、左右腦開發班、機器人編程、學前班等等，幾乎打着腦科學、神經科學等噱頭忽悠家長，對孩子的成长有害少益。再次，要消滅隱形變異培訓生成的需求側因素，比如規範幼小和小初銜接學期教學內容安排，堅持面向全體學生和按照教材要求安排教學進度，化解家長不必要的學業適應擔憂和早培衝動。要持續規範幼升小和小升初招生，抑制違規考試引致的奧數培訓需求，真正落實義務教育指標到校、搖號派位、公民同招政策，堅決遏制公民辦中小學提前掐尖招生、簽約招生，防止招生過程中生源惡性競爭。要建設兒童友好型城市 and 社區，確保家庭在假期普惠享受兒童設施，消除假期電子產品“帶娃”的焦慮。

（二）以終為始堅持基礎教育奠基個體長期可持續學習的價值導向

擔心不輸在“起跑線上”繼而過早“內卷”並加重課業負擔往往會預先透支孩子的學習精力。因為在低齡階段，少年兒童的身心脆弱，不能理解這種努力的社會意義，長時間在別人定義下、約束下的高壓學習，更容易在後續階段出現學習懈怠，也更容易累積焦慮抑鬱等心理問題。以我們對大學生的觀察，與“玩

命的中小学”不同,进入大学后一些同学学习动力大幅减退,开始“躺平”,保持持续学习热情的学生堪称凤毛麟角。高校给予大学生相对较多的空闲和选择空间,目的是让他们多方面尝试从而找到自己人生的志趣,但不想选择、不会选择的“空心化”现象,以及空闲时间打游戏、玩手机、追剧逛街、谈恋爱等现象并不少见。到了就读研究生的阶段,同学们仍然陷入从老师那里寻求标准答案的惯性,缺乏对于个人、自然和社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问不出像样的、有意思的科学问题。^{[15]、[16]}基础教育要做扎实是肯定的,但在教育普及率达到世界中高收入国家水平的条件下,我们需要根据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重新定位“基础”的指向。

从个体学习生涯的长程角度看,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60%的背景下,上大学只会越来越容易。如果一个人在大学里真正找到专业志趣,此时加倍努力并不算晚,也更合适。因为这时个体发育成熟,身心能承受一定压力,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基础。而且大学丰富的知识选择、知识与就业市场的接轨又容易与其专业志趣、未来职业性向匹配,从而激发学习者内在在学习动机并在某个领域做到“专精特新”,也能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因此,无论是家长、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基础教育不同学段的学校,都需要坚持保护和促进个体长期可持续学习的价值导向,避免短期功利化、阶段功利化、精致功利化对中小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韧性的过早、过度破坏。教育规律其实很简单、朴实和本真。人的成长是长周期的,个人每天拥有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一旦时间、精力的蛋糕被极致化的知识学习切割,过度地在这一领域拼时间、拼精力、拼健康,那他自然就必须承受其他领域不发展、少发展或破坏性发展甚至是反向扭曲发展的代价。

(三) 以多样性为目标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和人才选拔方式的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存教育体系适应过去模仿追赶型经济对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效率需求^[17],而且适应大一统的教育行政体系,管理方便、成本低。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人是多样化的,社会对人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同质化、单一性的培养体系必然导致竞争的极化、扭曲、变异。这样一种竞争格局,也很难当作是未来教育强国的理想特征。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龙头,但是我国高等教育金字塔体系被制度规范得相当同质化,导致塔底院校一味希望通过更名、升格、扩容向塔尖迈进。否则,它们在经费拨付、项目申报、招生安排、资源补给、声誉认同甚至学校名称上都被制度性排斥。客观地说,我国需要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但是也需要一流的本科学院、应用技术大学、职业技术大学和民办大学。在教育强国评价中,高技能人才占比恰恰是我国最大的短板。^[18]高中教育多样化已是我国多年前就提出的战略,但步履维艰,甚至有的中职学校反而转向了高考目标,更别谈艺术高中、文法高中、科技高中、女子高中、综合高中等多类型高中的建立了。义务教育的多样化探索近年来也有所退步。2014年我国台湾省公布“实验教育三法”,探索中小学有弹性的多元办学形态,在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新学习力方面产生了良好影响。^[19]未来需要对不同类型学校予以不同政策支持,引导它们聚焦主责主业、专精特新优势,从而形成多序列、多类型的“金字塔”。

最重要的是,要在确保公平诚信条件下,以多样化为目标推进考试方式改革。当前单一测试体系很难抑制群体性地聚焦书本考试的冲动。一些类似衡水中学的极化学业竞争、极化测试行为、压缩休息时间的改革往往在升学考试中取得佳绩^[20],从而得到家长或同行“用脚投票”式的推崇。相反,类似北大附中王铮校长等拓展素质成长的改革只好灰溜溜退场。^[21]当前,需要根据人才多样化成长要求,开展不同形式和科目的多样化考试。在保持艺术高考、体育单招等不同形式和科目考试的基础上,开设多科类的技术技能高考,使拥有某项技术技能特长的学生也能在具备基本文化素质下考入优质普通高校。同时,

打通各类高中学生向上攻读本科、研究生的通道，真正建立起人才成长的立交桥。当然，选拔方式多样化的同时必须加强选拔制度和技术的完善，防止人情关系对公平的侵蚀。

总之，通过多样化、结构性调整实现不同赛道都有优质教育资源、都有人才选拔方式的成长立交桥。尽管社会竞争无法消除，家庭的培训需求也不会绝迹，但家庭会根据不同赛道的要求、根据孩子的个性去选择参培其擅长、喜欢的内容，而不是单一地在书本知识的赛道上去反复“刷题”、去成为一个“做题家”，从而在教育领域真正形成各尽其才、各展其能，形成一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局面。

（四）以人职匹配或岗能匹配为中心推进主要劳动力市场选人用人机制改革

从更长期和广阔的背景看，要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经济地位竞争机制的改变倒逼教育竞争机制改变。尽管教育是个体竞争的基础，但应该坚持人职匹配、岗能匹配的基本原则选人用人，而不是依靠学历、名校这样的标签。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主要劳动力市场在招聘人员时应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其选拔录取资格不应以学生就读高校是否为“双一流”、是否在某个大学排行榜上靠前、是不是重点学科等为基本标准，也不应以是否具备博士、硕士研究生学历为统一限制条件。应当根据实际岗位需要设定准入资格，有些岗位可以允许职业技术本科生、高职专科生甚至中职生报考。地方在制定人才称号、人才项目政策时，应当为长期扎根技术技能一线的非遗传人、能工巧匠、高级技师等提供机会，培养和形塑一批高技能领军人才。这些在中央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有要求，但是落实效果不佳。比如，某地区2023年教育事业单位招聘条件中列出，应聘人员须具备以下其中一个毕业条件才可报名：中国“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毕业、全国第四或五轮学科评估为B+以上学科毕业、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类毕业、全球四大排名（QS、THE、ARWU、U.S.News）前200位境外高校毕业，获国家奖学金或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表彰的或普通高校表彰的优秀毕业生。^[22]还有的地方直接提出“985高校毕业生”的单招政策。^{[23]、[24]}这种招聘条件特别注重名校标签，对其他高校学生则看重综合能力，而且只招“普通高校”学生，把绝大多数地方高校的毕业生排除在外。

目前，从教育行政部门到人社行政部门仍存在学历迷恋、名校情结这样的不恰当人才观，扭转体制内这一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选人用人机制任重道远。与此同时，还要大力发掘和宣传各行各业中非名校、非高学历奠基但同样收入可观、工作稳定、持续成长的社会精英。事实上，这些人在我们身边广泛存在。要让广大家庭看到，即使没有名校光环、没有高学历加持，每个人只要在自己喜欢和擅长的赛道奋斗，人生同样有出彩的机会，同样有精彩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朱帅, 杨兆山. 社会流动视角下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的执行困境及其破解 [J]. 当代教育科学, 2022 (12): 77-83.
- [2] 高德胜. 沉重的学生负担: 角色的过度外溢及其后果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3 (12): 14-25.
- [3] 马健生, 刘云华. 教育中的资本扩张: 危害与治理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1 (4): 50-61.
- [4]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4-44.
- [5] 王爱云. 试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子女顶替就业制度 [J]. 中共党史研究, 2006 (6): 44-53.
- [6]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2: 433.
- [7] 陈钊等. 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 [J]. 经济研究, 2009 (10): 121-132.
- [8] 张展新. 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与劳动人口流动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2): 45-52.
- [9]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1-23.
- [10] 孙隆基.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63-66.

- [11] 黄光国. 面子: 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 20
- [12] 蒋芳, 王珏玢. 升学隐形加分乱象调查: 有家长帮孩子搞科研办画展 [J]. 半月谈, 2020-7-6.
- [13] 郑冰若. 中小学生家长教育内卷的逻辑及其焦虑消解路径 [J]. 少年儿童研究, 2023 (4): 120-127.
- [14] 刘建银. 基础教育产品短视频广告的叙事逻辑、传播异化及引导治理 [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023 (12): 61.
- [15] 温才妃. 为何我们的研究生提不出问题? [N]. 中国科学报, 2020-08-18 (05).
- [16] 计红梅. 研究生为何提不出问题: 关乎未来的思考 [N]. 中国科学报, 2021-01-12 (05).
- [17] 柯政. 建设教育强国应更加突出多样化发展 [J]. 教育研究, 2023 (2): 30-44.
- [18]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组. 建设教育强国: 世界中的中国 [J]. 教育研究, 2023 (2): 4-14.
- [19] 颜国栋, 杨郡慈. 《实验三法》的正面影响、问题及解决策略 [J]. 学校行政双月刊, 2022 (140): 298-322.
- [20] 何国胜. 我在衡水中学拼命跑 [J]. 读写月报, 2022 (2): 13-15.
- [21] 编者按. 王铮之后, 再无王铮? [J]. 当代教育家, 2021 (11): 54-55.
- [22]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教育事业单位 2023 年上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EB/OL]. (2023-5-24) [2023-9-27]. https://rlsbj.cq.gov.cn/zwx_182/sydw/202305/t20230524_11993590.html.
- [23] 赣州市国资委. 国投集团定向 "985 工程" 高校选聘 2024 届毕业生公告 [EB/OL]. (2023-11-14) [2024-4-2]. <http://gzw.ganzhou.gov.cn/gzsgyzcjdgl/c103213/202311/98972668884f4f41a51bd8f75327fee6.shtml>.
- [24] 铜仁市人社局. 2021 年定向 "985 工程" 高校选聘优秀毕业生公告 [EB/OL]. (2020-9-30) [2024-4-1]. http://rsj.tr.gov.cn/zwgk/xxgkml/rsxx/sydwzp/202009/t20200930_63866520.html.

(责任编辑 满仓)

The Social-Educational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Path for the Academic Overburden o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IU Jianyi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 SES relies on obtaining education from schools,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labor market restricts the competition to high-quality resources within the general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The demand for fairness also simplifies the standard of competition into the ranking of scores which is measurable through the knowledge in the books. As a result,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tes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hat the learning process will become more advanced, that the time will be longer, and that the burden will become heavier. Excessive burden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learning resilience as well a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Reducing the heavy academic burden is a protracted battle that requires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ance of "double reduction", clarify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long-term sustainable learning, re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education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lent selection in order to break out of the Mobius cycle.

Key words: Academic overburden; Social-educational mechanism; Governance path